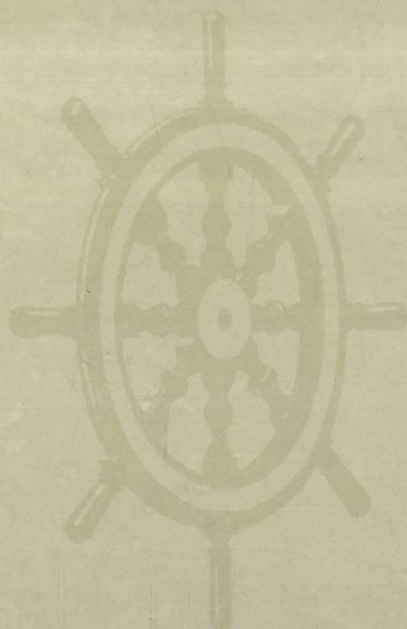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One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g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英] 詹姆斯·伦特 / 著

张全先 / 译



侯赛因传

18712

One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g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约旦国王 ——侯赛因传

〔英〕詹姆斯·伦特 著
张全先 译



时代文艺出版



0218712

译序

1952年，侯赛因登上了哈希姆约旦国国王的王位，那年他才17岁。从那时一直到他去世，他掌管约旦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40余年。

约旦虽是一个小国，但由于其处于当今世界最动荡、最复杂、最敏感的中东腹地，各种矛盾、各种利益在这里交汇碰撞，因此侯赛因的角色就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驾驭一叶小舟，其艰难其危险非经历者难以形容。在变幻莫测风云诡谲的中东舞台上，侯赛因不仅稳操舵轮，而且还能因势利导，躲过一次次风暴潮与一个个暗礁，确实令人有高山仰止之叹。

确实侯赛因身上卓越品质太多，他精力充沛、思想开明。他不受王室礼仪约束，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行使王权。他自己开汽车、驾飞机，自由活动，与人民保持较广泛的接触。他经常深入部队，与士兵关系紧密；他善于进行政治斗争，很会争取人心。他敢于冒险，躲过政敌一次又一次的刺杀；他灵活多变，度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危机。

侯赛因不仅使约旦这样一个与以色列有着600公里边界线，其人口60%是巴勒斯坦人的小国一直保持独立、自主与安定的局面；而且还在这个自然资源极端贫乏，五分之四为沙漠的国土上，建立了初步繁荣的民族经济，使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东地区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侯赛因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称赞侯赛因是

作者序言

这本传记记述的不仅是当代最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在书中我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但我坦白承认，我对这位国王满怀钦佩之情。

我们都清楚有两类传记：在一类传记中，作者就像小说家，相信自己能解答所有有关他的主人公的最重要的问题，并据此进行他的叙述；在另一类传记中，作者实际上是告知读者：“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所描写的是关于主人公的一切。你必须自己进行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选择了后者。

当然，如果不了解登基 35 年以来一直指导着侯赛因国王的那些原则，你就不可能理解侯赛因国王，不理解他在统治期间的各种关键时刻所不得不采取的那些决策。所以，我想有必要在本书开头写下这些原则，希望它能帮助读者理解国王的那些决策，否则，那些决策看上去要么太轻率，要么太小心，甚至是唐·吉珂德式的荒唐。

第一，他对哈希姆传统的忠诚。他是由祖父阿卜杜拉国王一手带大的，他深信哈希姆家族的伟大的使命。其祖父就是“阿拉伯大起义”的旗手，那次起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把阿拉伯人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另外，侯赛因国王的那种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不屈服的 tradition 使他成为这个最尊贵的家族的领头人，被赋予各种责任，并始终不顾艰难险阻，努力履行这些责任。

第二，他对阿拉伯主义或阿拉伯统一的责任。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他的曾祖父——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在争取阿拉伯自由的事业中拿起武器反抗奥斯曼人。尽管阿拉伯人对这种统一应当采取何种形式持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但是，他们都坚信这一信念。国王本人构想了一个更广大的民族主义，其中，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将保持自身的完整，直到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有可能铸成一个更全面的联盟时为止。

第三，他对阿拉伯团结的责任。国王相信，为了阿拉伯的整体利益阿拉伯各国必须不能各执己见，只有这样，阿拉伯的团结才会实现。正是由于持有这种想法，他才同意纳赛尔总统的要求，于1965年断绝了与联邦德国的关系，虽然当时国王是反对采取这一步骤的。

第四，他对巴勒斯坦事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责任。在国王看来，他的曾祖父谢里夫·侯赛因宁肯退位，也不同意“把巴勒斯坦从阿拉伯世界中分离出去”。侯赛因国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

第五，他对在阿拉伯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责任。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与伊斯兰教冰炭不能同炉。因此，便使他倾向西方了。

最后，他对约旦在哈希姆家族统治下生存下去的责任。约旦十分容易遭受外来的压力。它的长期生存，一方面决定于内部稳定，一方面决定于它与阿拉伯邻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正是要生存下去的责任，常常影响着侯赛因国王的外交政策，有时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阿拉伯团结的原则相冲突。如果不能使国家生存下去，其他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这些就是过去曾指导并且现在仍在指导着国王完成他的艰巨使命的原则。迄今为止，在他的统治下采取许多困难的策略，在这过程中，他是否成功地依照这些原则办事了，读者们

将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必须说明，这不是一部“官方”传记；我既没有受国王的委托，也没有受约旦政府的委托来撰写它。但它的撰写征得了国王的同意，并且得到了许多约旦人的合作，对此，我非常感谢。不过，在这里所表达的只是我的一己之见。无论在哪些方面，它们都不代表国王或他的那些顾问。

詹姆斯·伦特

1988年11月1日

导 言

哈希姆家族

他的名字尊贵，他的性格尊贵，他自己也尊贵。

1935年11月14日，侯赛因·哈希姆家族的第三代约旦统治者降生在安曼紧靠拉杰哈丹宫他父亲的房子里。他的诞生对于他的父亲埃米尔·塔拉勒和他的母亲埃米拉·扎因来说，是件大喜事，他们是在去年11月结婚的。塔拉勒是外约旦的统治者埃米尔·阿卜杜拉的长子和继承人，阿卜杜拉自豪地驱车穿过安曼欢呼的人群，前往清真寺，感谢上帝赐给他一个孙子。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地位是安全的，家族已经后继有人。

哈希姆家族是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嫡系后裔，因此是伊斯兰最尊贵的家族。他们来自伊斯兰教祖的宗族库雷希和他的部族哈希姆。他们是从伊斯兰教祖的女儿法蒂玛和她的丈夫阿里那里沿袭下来的，这支血脉延续了近14个世纪。他们属于哈希姆部族的达维奥恩部落，麦加王子和圣地保护人正是从达维奥恩和达维扎因部落中挑选出来的。

他们被称为谢里夫，这个词是尊贵的意思，表明他们是伊斯兰教祖的后裔。这个词的阿拉伯语复数是阿什拉夫。有很多人自称是伊斯兰教祖的后裔，也被别人叫做谢里夫，然而，只有达维奥恩和达维扎因部落的哈希姆家族才能指望被尊为麦加

王子。当本书故事开始时，即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哈里发任命达维奥恩的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为大谢里夫和麦加王子，当时，他正在土耳其都城流亡。8年后的6月10日，也就是穆斯林日历的第九个沙班日，谢里夫·侯赛因打响了第一枪，发动了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阿拉伯大起义”。在奥斯曼的践踏下，阿拉伯人遭受了400年的苦难。两年后，即1918年的10月1日，阿拉伯军队在谢里夫·侯赛因第三个儿子埃米尔·费萨尔的率领下开进了大马士革，结束了奥斯曼的统治。

作为对他领导起义的回报，英国向谢里夫·侯赛因许诺给予经济援助、指导和武器，把阿拉伯各省从奥斯曼的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得到自治。这支阿拉伯军队一部分是由从奥斯曼军队逃离出来的阿拉伯正规军，另一部分是由贝督因部落游民组成的。这支阿拉伯军队后来在沙漠上协同从埃及推进到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作战。这支由埃米尔·费萨尔率领的阿拉伯军队，其英国军事顾问中有T·E·劳伦斯上校。另一支阿拉伯军队由谢里夫·侯赛因的长子埃米尔·阿里和次子埃米尔·阿卜杜拉挂帅，他们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塔伊夫，还把土耳其人围困在麦地那。

然而，英国政府没有兑现它对谢里夫·侯赛因许下的诺言。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主要的西方盟友，在1916年由马克·赛克斯爵士和M. F. 乔治·皮科经过谈判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这项协议把土耳其的前阿拉伯各省在英法之间进行分配，直到它们的新主人认为它们可以实行自治时为止。可以想象，谢里夫·侯赛因对这个他认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非常愤怒，他将被留下来统治汉志（希贾兹），在1917年被宣布为汉志国王。称为“赛克斯-皮科协议”的文件把前奥斯曼统治下的叙利亚省一分为三，法国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得了巴勒斯坦。英国

还得到了伊拉克，它以前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切于1920年4月在圣雷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得到批准。阿拉伯国家将成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地，对大多数阿拉伯居民来说，国际联盟几乎是个毫无意义的名称而已。

随之又出现了一个更深刻甚至更具有长远影响的复杂情况，1917年11月，当时的外交大臣A·J·贝尔福代表英国政府讲话，宣布支持“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阿拉伯人感到这一次又被人背叛了，因为这样做只会牺牲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利益，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家园已经1400多年了。谢里夫·侯赛因明确表示，他绝不能同意这样做，然而，他的抗议却遭到人为的不理睬。更有甚者，已经被叙利亚议会选为叙利亚国王的埃米尔·费萨尔竟被法国赶走了，他在有权要求得到胜利的成果时，却被迫流落他乡。在伊拉克，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已被授予王位，但伊拉克代表的这一愿望也同样被英国拒绝了。阿拉伯人被那些巧舌如簧的人出卖了，他们轻信了这些花言巧语。必须指出的是，英国政府和行政部门没有一个成员赞成这项政策。无论是外交大臣寇松勋爵，还是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都不同意英国对巴勒斯坦承担责任。然而，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却对这些意见不屑一顾。

英国人并非对叙利亚真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实际上是在别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想让法国人把法国的影响向南方扩展得太远，以致侵犯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把源自叙利亚省余下部分的约旦河以东的沙漠和山脉地区排除在赛克斯—皮科协议之外，并把这部分命名为外约旦。叙利亚省的这一部分与巴勒斯坦紧密相联，实际上无论是民族还是经济条件都很难区分，由于战争的原因却使这里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这里八分之七是沙漠，在这里贝督因人各部

落自由游牧，奥斯曼政府垮台后没有留下任何行政隶属的固定居民。这地方变成敌对部落之间无主的土地。

这些部落分成两类，一类是游牧民，他们带着自己的骆驼群及山羊和绵羊群在沙漠中到处游牧；另一类是定居居民，他们住在房子里，耕种土地。前者是贝督因人；后者是法勒斯，或称之为农民——在约旦称做哈德哈里。贝督因人自称是阿拉伯人，并为自己的强壮体魄和自由的生活感到自豪。他们的环境是残酷的，他们的生活艰难的，当他们于公元 633 年突然出现在阿拉伯半岛的中部时，立刻成为伊斯兰的先驱者。在阿拉伯语中，他们更通常地被叫做阿尔巴杜，其单数形式是巴杜伊。由于某些原因，西方人总是把他们想象得十分浪漫，其中部分应归结于两位作家：T·E·劳伦斯和查尔斯·道蒂。在他们的文学名著《栋梁之材七圣贤》和《阿拉伯沙漠》中，两位作家各自对贝督因人进行赞誉和诋毁。由于贝督因人在约旦的哈希姆王族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他们略加详述。

关于贝督因人，最简洁的定义或许要算是陆军中将约翰·格拉布爵士下的。他写道：“我们发现，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贝督因人是一些特定部落中饲养骆驼的游牧民。”这些部落是在他们自己的首领统治下划分的，贝督因人对首领绝对服从，只要这些首领赢得他们的尊重。这些部落几乎全部依靠骆驼生活。一个贝督因人财富的多少按照他的骆驼群来判断，其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袭击其他部落以夺取骆驼上了，他们称骆驼为“加齐祖”。但是，在这种战争中，妇女和孩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一点上形成了斗士传统，这种传统常常在咖啡厅的英雄民族民谣音乐会上得到颂扬。他们不屑使用铁锹，怕弄脏了自己的手；他们看不起种地的农民，无论是什么时候进入沙漠边上的城镇或乡村，他们都用碎布把鼻孔堵住，不去嗅文明世

界的有害气味。他们的社会大概是地球上最平均主义的社会，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未开化的、不受约束和不可驯服的，是真正被社会抛弃了的人们。在这里定居的阿拉伯人对他们是又害怕又轻蔑，就像当初美国殖民者对土著印第安人的看法一样。

尽管每一个贝督因部落都拥有自己确定的放牧区，但是，由于不断需要新的牧草，经常到处游牧，无法定居。他们每年都进行大迁移。不论帝国是兴是衰，这种大迁移已持续了几千年。国际边界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直到最近，他们才有了一点国家观念。他们首先是忠于家庭，其次是宗族，再次是部落。由于笃信宗教，贝督因人对哈希姆家族怀着极大的尊重之情，把他们看做是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后裔和圣地保护人。反过来哈希姆家族也重视培养贝督因人，常常派来男孩子和他们一起生活一二年，学习沙漠生活的经验。在大部分地区是沙漠的外约旦有两个主要的部落，他们是贝尼萨卡哈和胡威塔特；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部落。他们相互之间经常争斗不休，或者就是袭击沙漠边缘上的村落。他们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始终是把骆驼出租给那些每年从大马士革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圣的人；自从1908年开通了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的汉志铁路，使他们本来就不稳定的经济遭到破坏。尽管在反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中，英国人慷慨地分发了一些现代武器和黄金，情况并没什么改善，先进的武器只使古老的抢骆驼的把戏比从前造成的伤亡更大了。

贝督因人几乎都是文盲，他们好争斗，爱发火，有很强的自尊心。“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被他们视为座右铭，他们有很多敌人。浴血仇杀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可是，他们的浪漫天性，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迷恋，他们的热情好客，他们的坚强和忍耐力又形成了贝督因人的另一面。探险者威尔弗雷德·西斯格讲述了本·卡比纳的故事，他是在1946~1947年

间陪同西斯格遇到安普蒂夸特尔的两个贝督因人中的一个。西斯格发现他只用一块缠腰棉布裹着便睡倒在寒气逼人的沙子上时，就问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给他的钱买一条毯子。本·卡比纳答道，“我不在乎寒冷，我是一个贝督因人！”他是想用这些钱买骆驼，那是贝督因人的命根子。有时候，这些部落的男人对待骆驼比对自己的妻子还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处于一片动乱之中。一是打碎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如前所述，由于有了现代武器；二是在阿拉伯半岛的中部内志出现了一个狂热的和清教主义的穆斯林派别——瓦哈比斯，他们自称是埃克哈万（兄弟会）。内志的埃米尔阿卜杜勒·阿齐兹·本·沙特是个非同一般的人，他始终在巧妙地利用兄弟会来帮助实现自己的野心：成为“贝督因国王”和阿拉伯半岛中部的主人。瓦哈比斯恪守最严格的伊斯兰教的信条，他们把惩罚那些同一宗教中不遵守自己严格教规的教徒当做自己的使命。他们以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实行惩罚，在广大的地区饿虎扑食一般地袭击毫无戒备的贝督因人，不分老幼屠杀所有的男性。贝督因人达几个世纪的战争传统被丢在了一边，让人恐怖的埃克哈万这个词追随着贝督游牧民，不管他们流浪到哪里。

在遭受战争蹂躏以后居民定居区也同样一片混乱。1920年夏天在伊拉克曾爆发了反对英国人的起义，英国调来了3万军队才得以平息。在叙利亚，法国人强占了大马士革，驱逐了埃米尔·费萨尔，激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强烈不满。在巴勒斯坦，赫伯特·萨缪尔爵士（后为勋爵）担任首任高级专员，建立了一个托管政府，企图把巴勒斯坦和外约旦都包括在内。在各地，阿拉伯人都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背信弃义行为感到义愤填膺，都严重关切着贝尔福宣言的后果，他们处于焦虑和气愤之中。

1920年11月，在混乱之中又传来了一个消息：谢里夫·侯赛因的次子和得力助手埃米尔·阿卜杜拉来到了马安，马安当时在汉志境内，但现在属于约旦。从表面上看，他离开麦加，前来视察汉志北部，随身带着一小支正规部队，但也远远超过了部落的兵员。他的主要同伙是谢里夫·沙基尔·本·扎伊德，一位在阿拉伯大起义中涌现出来的人物；他是陆军元帅谢里夫·扎伊德·本·沙基尔、现任约旦武装力量总指挥的父亲。阿卜杜拉在马安受到热烈欢迎，并接受邀请继续乘汉志铁路火车前往安曼，这段铁路刚好可以在两个城市之间使用。途中，阿卜杜拉在卡拉克短暂停留，会见了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包括一位年轻的陆军中尉亚历克·柯克布赖德，在战争期间他当过T·E·劳伦斯的部下，当时正担任卡拉克短命的“穆阿布国民政府”的顾问。他们两个人后来成了好朋友。

1921年3月2日，阿卜杜拉来到安曼，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他住在赛义德·穆夫蒂的家里，赛义德是当地切尔克西亚人社区的领袖，后来成为他的首相之一。安曼在罗马时期曾享有大波里斯——费城的美誉，可经过岁月的破坏已今不如昔，其规模只相当于一个大村庄，有2000人左右，绝大部分是切尔克西亚人，他们是在18世纪70年代被俄国人赶出高加索山后，由土耳其人安顿在这里定居的。阿卜杜拉已经告诉他们，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他的弟弟费萨尔恢复叙利亚，但是，他发给耶路撒冷的赫伯特·萨缪尔的电文却解释他的目的不是好战，而是安抚。他说，此行是为了恢复当时已遭破坏的法律和秩序。

阿卜杜拉是在伊斯坦布尔这个都市社会中长大成人的，他的父亲因被怀疑同情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而于1893年被萨拉丁·阿卜杜勒·哈米德流放到这里。那时，阿卜杜拉年仅11岁。虽然一些作家喜欢拔高人物而牵强附会，阿卜杜拉和他的兄弟

们就是那种贝督因沙赫斯人，但这远不是事实。到1908年他的父亲谢里夫·侯赛因返回汉志时，阿卜杜拉已经是土耳其议会成员和他父亲在国家事务中的得力帮手了。在同英国人的谈判中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次谈判在阿拉伯大起义中达到高潮。他在以后的战争中负责统领阿拉伯军队。他的土耳其语特别熟练，英文也相当不错。阿卜杜拉既是一名军人，又是一位外交家，他的孙子侯赛因继承祖父的这两点，能文能武。他也具有极大的个人魅力。

他在1902年同他的表妹谢里法·穆斯巴赫结婚，1909年生下一个儿子塔拉勒，后来又生下一个女儿哈雅。1912年他同一位土耳其妇女结婚，生下三个孩子，一个是儿子纳伊夫，生于1914年，两个是女儿——马格布拉和穆尼拉。数年后，他又同苏丹人纳希达结婚，但没有再生子女。

英国政府担心阿卜杜拉到达安曼会引起他们同法国人的麻烦，法国人当然反对阿卜杜拉向叙利亚方面的进一步的发展。幸运的是，这时正碰巧在开罗召开了一个会议，与会者包括所有最重要的英国在中东的代表，会议由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主持。英国在中东承担了新的责任，其结果是英国人在军事和经济上都被搞得极其紧张，同时，他们在战时征来的士兵正吵吵嚷嚷地要求退伍。这样英国人不得不采取收缩措施。

实际上，在阿卜杜拉到达安曼以前就已经决定授予费萨尔伊拉克王位了，作为他被法国人赶出叙利亚的一种安慰，虽然在一开始曾准备把伊拉克给阿卜杜拉。为减少军事人力消耗，英国皇家空军负责起这块新托管地的内部安全和国防；同时还决定对约旦河以东地区，即被称为外约旦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这将是一个在阿拉伯人领导下的阿拉伯省份，省长要对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高级专员负责。当丘吉尔于1921年3月26日离开开罗、前往耶路撒冷时，最受欢迎的省长候选人是埃米

尔·扎伊德，谢里夫·侯赛因的小儿子。

3月28日，阿卜杜拉应邀在耶路撒冷会见丘吉尔。他重申了他向高级专员作过的声明，即他前往安曼的目的是恢复法律和秩序。他同时提议，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应当合在一起，由一位阿拉伯国王领导。他把这项建议重复了三次，另一种选择是把伊拉克和外约旦连在一起；但是，这两种方案都被丘吉尔婉言拒绝了。相反地，丘吉尔建议外约旦应当成为哈希姆公国，并把公国交给阿卜杜拉。这是一个与伊拉克完全相反的建议，外约旦实际上全是沙漠，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而且，还有那个贝尔福宣言要考虑。阿卜杜拉与犹太人定居问题毫无关系，他严厉指责萨缪尔在巴勒斯坦把树木连根拔掉，腾出地方让犹太移民定居。萨缪尔则回答说，巴勒斯坦有足够的地方种更多的树和让移民居住，根本没必要把树连根拔掉。

丘吉尔当时向阿卜杜拉提供资金支持，还同意把外约旦排除在贝尔福宣言的条款之外。作为进一步的诱惑，他暗示，外约旦完全可以成为通向大马士革王位的跳板，只要阿卜杜拉能同法国人达到妥协，控制那些正在外约旦寻求庇护的叙利亚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他说，陛下的政府当然将顺利地看到哈希姆家族登上叙利亚的王位。

除了同丘吉尔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以外，阿卜杜拉想凭自己的才干、能力让英国人对他刮目相看，就是他无须英国军队的帮助就能建立对这个地方的控制，尽管他也说过，一定形式的“空中支援”将是有帮助的。由于军事力量是一个紧要问题，所以，阿卜杜拉的保证特别受欢迎。不过，他没有完全彻底地接受外约旦，而是同意组成一个政府，尝试六个月。这同他兄弟费萨尔的意见完全一致，费萨尔在遭受了叙利亚的痛苦经历以后，比谢里夫·侯赛因更清醒地意识到了阿拉伯人的谈判地位是何等虚弱。正如费萨尔在1921年1月19日写给他的